调查显示：我国男性公务员吸烟率61.0%，52.7%吸烟的公务员表示从未戒烟，仅有37.3%表示近期有戒烟愿望。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的规定，触及了我国控烟最难最复杂的群体。

# 官场禁烟令 面临落实大考

□本报记者 姬薇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模范遵守公共场所禁烟规定，不得在学校、医院、体育场馆、公共文化场馆、公共交通工具等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各级党政机关公务活动中严禁吸烟。公务活动承办单位不得提供烟草制品，公务活动参加人员不得吸烟、敬烟、劝烟，严禁使用或变相使用公款支付烟草消费开支。

此《通知》一出，引来叫好声一片。

而且《通知》恰在我国传统节日元旦、春节前公布，可谓及时且意味深长。

一位网友留言：领导干部带头禁烟，既可树形象、保健康，更能防腐败。

但公众普遍存在疑虑：《通知》提出的五项要求，真正触及到了我国控烟最难最复杂的群体，这项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规定能得到有效落实吗？

如今，一些官员手握重权，因为有吸烟的嗜好，高档香烟便被一些人当做行贿的敲门砖，成为腐败的温床。《通知》中的第三条公务活动承办单位不得提供烟草制品，实际上涉及到了老百姓痛恨的腐败问题，如果顺利实施，则显得意义重大。

人们常说，干部怎么干，群众都看。一些高档香烟动辄一条上千元，往往被拿来送礼，送官员高档烟的背后是有所求，进而形成一种交换。老百姓总结为“买的不抽，抽的不买”，近年来领导干部抽“天价烟”被屡屡曝光，已严重危及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公信力。

此外，中央要求“领导干部要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对落实公共场所禁烟，带动全民守法，维护全民健康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医学专家认为，在空气污染严重、饮食结构改变、人们普遍缺乏运动的情况下，各种慢病高发并呈现低龄化的今天，领导干部带头执行公共场所不吸烟，能起到引导公众建立健康生活方式的作用。

其实，自2011年5月1日起，《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就已颁布施行，但在执行过程中，禁烟工作在各地遭遇“走过场、无实效、难坚持”的困境，大小会议照样云雾缭绕，特供香烟花样翻新，“烟草腐败”屡禁不止。控烟氛围的难以形成，被认为与一些领导干部带头违规不无关系。

山西河曲县原政协主席开会时曾花6万多元公款购买150条中华烟，参会者每人每天发一包。湖北公安县2009年、2013年两次以“红头文件”形式强制摊派卖烟，全县折合人均60包烟。

我国签署国际控烟公约已经10年，全球烟草产品销量下降10%，而我国却上升了41.8%，增速全球最高。一些地方政府本应是控烟禁烟的推行者，却变成了烟草购买者甚至推销者。

哈尔滨市疾控中心防烟办主任张敬冬对记者说，在控烟执法中说情人太多了，每个环节都会使处罚终结，所以，我们要求所有人在执法前一律关闭手机。

有调查显示：我国男性教师吸烟率50.2%、男性医务人员吸烟率47.3%、男性公务员吸烟率61.0%，52.7%吸烟的公务员表示从未戒烟，仅有37.3%表示近期有戒烟愿望。在这三类有影响的人群中，男性公务员吸烟率最高。很多领导干部长期吸烟，不仅对自己身体有害，而且不利于单位创建无烟环境，没有起到好的示范作用。

一位朋友讲述了他的亲历：单位的全体会即将开始，领导点燃了一只香烟，一位老员工突然站起来说，屋里这么多人，领导能不能不抽烟，此领导尴尬地掐灭了手里的烟，自此领导们再没有人在这位员工面前抽过烟；几年后，新领导上任，这位老员工又一次指出领导不要在会上抽烟，而新领导仿佛没有听到继续吞云吐雾，这次轮到这位员工尴尬了，会后有人劝她别再这样了，招领导不高兴对自己没有好处。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敢于理直气壮地制止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吸烟的并不多见，即使有中央规定甚至是法律撑腰。因此，没有强有力的执法体系和问责制度，官场禁烟很难取得预期成效。

对此，中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梁晓峰表示，我们将做好包括制度的拟定、环境布置、监测评估以及提供戒烟服务等工作。希望公众媒体有监督功能，包括随手拍，对领导干部所在的办公场所，进行监督。他建议培养领导干部的党校、行政学院应该有控烟的内容，以教育党员干部。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协和医科大学杨功焕教授一语中的，在中国只有领导干部不吸烟和领导干部重视控烟才能更好地控烟，将吸烟与反对腐败一样，由党政齐抓，才能取得成效。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说，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吸烟造成的影响十分恶劣，公共场所吸烟不光危害他人，这样的领导也不可能把本单位无烟环境落实好的，所以要想推动我国控烟工作，领导干部带头非常重要。

至于遇到不执行的领导，我们该怎么办？吴宜群认为《通知》的第五条给出了答案：领导干部要主动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她说，遇到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吸烟可以先劝说，不听可以用相机拍下来给予曝光，在中央反腐倡廉、匡正风气举措密集出台的当下，此项《通知》可以看做纳入到改变官员作风廉政建设里面的。

元旦刚刚过去，紧接着春节就要到来，又逢节日送礼高峰期，领导干部们能否做到不收高档烟礼品，并努力做到在室内及公共场所不仅自己不吸烟，还劝导他人不要吸烟？

一场对官场烟民的大考才刚刚开始。

热点关注

## 301医院救助贫困患儿753名

**本报讯** 近日，国家民政部李立国部长一行专程来到解放军总医院，看望慰问正在接受救助治疗的贫困患儿，并对总医院携手多家慈善组织，积极救治贫困患儿取得的突出成绩予以高度评价。

据统计，2009年至今，解放军总医院先后救助贫困患儿753名。

（王继荣 罗国金）

## 中日友好医院医联体成立

**本报讯** 近日，朝阳区东部医联体——中日友好医院医联体正式成立。

中日友好医院医联体由核心医院与合作医院组成。核心医院为中日友好医院；合作医院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奥运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16家。医联体成立后，各成员单位都将统一悬挂“中日友好医院医联体成员单位”标志。（周倩）

## 公益电影关注留守儿童

**本报讯** 近日，由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计生协、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全国农民工文化送温暖行动组委会指导，中国首部反映留守家庭健康的彩色故事片《为了你的微笑》已批准立项。

在中国，留守儿童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在他们身上寄托着千万家庭的希望。中国人口宣教中心、中国电影家协会希望用电影的形式来探讨关于留守儿童的问题，让全社会来关注留守儿童。（海燕）

## “老年医疗专职志愿者”上岗

近日，在北京老年医院的门诊大厅，医院党委书记田喜慧代表医院志愿者协会正式授予退休职工王玉琴“老年医疗专职志愿者”证书。从2014年1月1日起，王玉琴正式持证上岗，放弃休息时间，无偿地为前来就诊的老年患者提供专业的导医和咨询工作。

据悉，北京老年医院将建立以王玉琴为代表的专职志愿者队伍，号召全社会有识之士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向社会传递正能量，为营造良好的医疗环境而共同努力。 田源文/摄

健康速递

# 大病康复治疗入城 矿工难承受的伤痛

蒲德贵 张明英 图/文

“妻子每个月到县城透析12次，医药费报销80%，自己还要支付3000多元，叫我们一家人怎么生活呀！”1月1日，重庆能源集团石壕煤矿掘进623队员工李攀文为妻子患大病，到市县大医院接受康复治疗的一连串琐事而叫苦，不是他一个人承受不了，已经影响到整个矿区数万名矿工家庭的生活情绪。

近年来，发生在矿工家庭成员中的大病成上升趋势。尤其是特种大病，必须到100公里外县城、150公里外市区医院接受康复治疗，这无疑加重了矿工家庭的负担，导致矿工家庭一名成员患大病而返贫的现状尤为严重。

以重庆能源集团松藻煤电7对矿井为例，发生在矿工家庭中的特种大病也不少，比如尿毒症、各种癌症和一些在村镇、企业医院难以治疗的疑难杂症也成上升趋势。一旦查出病因，动辄只能到县级、市级以上的医院救治，往返交通费、家庭成员去护理的费用和住院期间的床位费都不能进入医保报销之列。

大病治疗后形成一种怪圈，后续康复治疗必须到县级、市级医院，直接影响到患者家庭生活。尤其是尿毒症这一特殊病种，更为严重。

据了解，重庆能源集团石壕煤矿拥有8000多矿工家属，患尿毒症者已超过10多人。在该矿区7对矿井单位中，患此病的人也不再是少数。

矿工家庭成员患上尿毒症，每周到县级医院接受2~4次透析，医保免去80%费用，作为病人，每一次透析还得支付200多元的医药费，再加之到县城路途、生活费等等，几乎用掉了“一个矿工养活一个家庭”年总收入的85%。

掘进623队李攀文的妻子患尿毒症两年多来，他每天担心的事很多，自己在井下的安全、妻子透析的药费、孩子在外地上大学的费用等等。他每月挣得近3500元工资，扣除“五险一金”600多元，支付妻子不能报销部分医疗费、交通费，所剩无几。

李攀文的妻子患尿毒症，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孩子在外读大学，全靠他一个人打点，在企业的关心下，工作上给他减轻负担，但他一家人除去医药费支付，原本幸福的小家庭从此返贫。李攀文说：“我们矿区周边的镇级医院、企业医院，都没有专门治疗尿毒症的血液透析设备，妻子来回倒腾在县级医院和矿区之间，好人都要绊成病人，真是难呀！”

尿毒症康复治疗要到县城大医院接受透析的费用很高，需要一名家庭成员照顾，进一步加重矿工家庭的负担。为此，矿区许多患上尿毒症的病人，采取传统药物透析治疗，费用虽说降低了，但在家庭中进行自我透析的方法，全凭自己当医生、护士，治疗安全也是一大隐患而存在于他们身边。

两年来，退休矿工樊世荣患尿毒症，接受医院血液透后，为了减轻家庭负担，采取家庭药物透析治疗。他最担心的是在家里面没有专门的医护人员指点，医疗器具消毒、药物产生的副作用等问题该怎样去处置？成为他老人家心中的一块心病。

退休矿工樊世荣每月收入1800多元，月支付的药物透析费用也在2000元左右，家庭式药物透析，虽说减轻负担，他无奈地说：“我这把年纪了，长年累月住在县市大医院治疗，费用高，一家人就要把嘴‘封’起来，这也是没得办法的办法。”

重庆能源集团松藻煤电公司退休矿工吴学银住进医院一年多，妻子又患大病住进医院接受治疗，独生子女患病夭折，老两口所在医院的治疗地点又相隔近100公里，无亲人护理，每天要各支付100元护理费，原本只有2000多元退休工资的家庭收入，支付了护理费，却生活费又没有了着落，令他们一家人头痛不已。

矿工家庭成员发生大病，只有县市区大医院能够康复治疗，虽说医保能够报销，其它的交通、护理费等高额费用是报销不了的，加剧了矿工家庭返贫不再是个案个例，而是一个群体出现。笔者呼吁，在乡镇、边远矿区医疗短缺的情况之下，希望有关部门在城乡之间集中的社区、矿区，建立起一个病人消费得起的尿毒症透析、癌症化疗服务中心，以此来缓解老百姓就医难的负担，不至于导致更多的家庭因病而返贫。

上图为志愿者看望患重病的空巢退休矿工欧长福（左二）。

# 因车牌而“换妻”的荒诞

文/舒年

在完全依赖行政化手段的“摇号”政策之下，北京市民最近竟想出奇招：和天津市民“换妻”。拥有北京车牌的天津市民和拥有天津车牌的北京市民把牌照过户给各自妻子，然后分别离婚再与对方妻子结婚，将对方车牌过户到自己名下，随后再离婚，最终和原配复婚。如此戏谑之举风行网络，折射出部分公众对现行“摇号”政策的无奈。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市场应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深入人心。但在全会闭幕一个多月后，北京公布的2014年控车方案里，对于呼声不小的“号牌拍卖”依然只字不提。而同样执行汽车限购的上海、广州以及即将加入限车大军的天津，都引入了市场机制来调控机动车总量，采取全部或部分车辆指标拍卖的方式。

北京控车的两大目的，一是缓解拥堵，二是净化空气。但仅靠限制机动车总量显然有失偏颇。北京道路面积占全市建设面积的11%。不及发达国家城市的一半，根据交管局的数据，由于全市无南北干道，导致南北向车辆有七成居然要上环路兜圈。而中心城区改造缓慢，摊大饼式的建设模式导致职住分离，亦是拥堵重要因素。根据该市交通委的调查，摇号购车是民意支持最低的治堵方法。至于污染，则成因复杂，也可通过淘汰老旧机动车等方式予以有效缓解。

在道路拥堵、车辆停放空间较少的都市，私家车属于高档商品而非保障品，政府要做的是“保基本兜底线”，全力保障公交出行的便捷与舒适，对于私家车资源分配，应当交由市场处理。仿照上海，以车牌拍卖收入补贴已经让财政不堪重负的公共交通，方为公交与私车共赢之道。

每周快评

# 30年来中国肥胖人口比例翻番

**新华社伦敦1月3日电**（记者刘石磊）英国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发展中国家肥胖成年人口30年来增长近4倍，超过9亿人处于超重或肥胖范畴。专家警告说，肥胖所导致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患病人群可能随之大幅增长。

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发布的这份报告说，198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超重或肥胖人口从约2.5亿猛增至约9.04亿，而发达国家中此类人口约为5.57亿。身体质量指数（BMI）超过25属于超重或肥胖，全球超重或肥胖者在成年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由1980年的23%升至2008年的34%。

报告称，从地域和国别来看，中国和墨西哥在这一时期内肥胖人口比例几乎翻番，中东和拉美地区也有大幅增加。

报告认为，上述趋势主要与人口和饮食结构的变化有关，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增加后，饮食开始出现高脂肪、高含糖量、多油多肉等特点。除饮食外，缺乏锻炼也是重要原因。

报告主要作者之一、海外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史蒂夫·威金斯说，这一增长趋势“令人担忧”，受此影响，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的发病率可能大幅上升，给公共卫生系统带来巨大负担，各国政府应尽快采取措施。

# 陕西省年度考核指标环保比重将增加

**据新华社西安1月4日电**（记者郑昕）记者从陕西省环保厅获悉，从2014年起，陕西省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制中的GDP分值将下调，而生态环保指标分值则会增加。

据介绍，从2014年起，陕西省各市GDP达到全省平均值视为完成任务，超额完成任务的不再加分。而生态环保指标分值增加，超额完成治霾任务还能加分。

尽管在2014年考核指标中仍保留一定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指标，但陕西省将“生产总值增长率”指标由原来的8分下调为6分。增设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城乡居民总收入占GDP比重、城镇化率等反映产业和城乡结构优化的指标。

# 河南巩义“12·22”煤矿透水事故涉嫌瞒报

## 首批13名责任人被处理

**据新华社郑州1月4日电**（记者马意翀）2013年12月22日，巩义市竹林镇境内河南大峪沟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炭煤矿东翼采煤队发生透水事故，7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另有9人受伤。巩义市核查组初步认定，在事故信息上报方面，东翼采煤队、竹林镇和大峪沟煤业涉嫌瞒报，并对首批责任人作出处理，其中，移送司法机关4人，免职和停职9人。

2013年12月22日11时左右，东翼采煤队实施爆破时发生涌水，16人被困。竹林镇迅速组织了抢险救援，至13时10分左右，16名矿工全部被抬出矿井，送往医院抢救，其中7名抢救无效死亡，9名受伤。事故发生后，竹林镇自行组织善后，与伤亡矿工家属达成赔偿协议。

（上接第1版）

## 各地规定趋细 高档礼品遇冷

受“八项规定”影响的商品不止挂历，还有各种高档礼品。“以前中秋节发月饼很正常，今年什么都没发。”北京海淀区某机关刘科长如是说，“现在送礼品很敏感，过节打电话发短信问候就可以了。”

刘科长告诉记者，中央禁令在全国是“八项规定”，具体到北京市是十二项，海淀区是十六项，越到基层规定越细。“往年单位间都会互寄明信片，区里还会下通知，可统一购买。今年既没单位给我们寄，我们也没给别人寄。”

“现在是明文规定，而且非常明确具体，不像原来是原则性规定，相对模糊。”刘科长说，“能感到这次是下大决心了。”

关于送礼，某大型国企干部给记者讲了个故事。一部队转业老乡带了土特产来京，想拜会同乡的某部委处长，处长电话里几番推脱，最后约在地下车库见面。“东看西看，像地下党接头。”

2013年9月3日，中纪委和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发出《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要求节日期间严禁用公款送月饼送节礼、严禁公款吃喝、旅游、健身和高消费等娱乐活动。

此后的中秋节，高端月饼市场业绩下滑，部分月饼商转型售卖平民月饼。

11月22日，中纪委再次下发通知，要求元旦、春节期间继续落实好八项规定精神，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烟酒、花卉、食品等年货节礼。

“营业额下降60%左右。”月坛南街，烟酒礼品专卖店店主罗小刚连连摇头，“以前大多是集体购买，大闸蟹的礼券2012年一天就能卖五六万元，2013年最高也才卖2万多元。”

数据显示，浙鲁晋多地出现茶叶价格下滑，西湖龙井的收购价一度在5天内下跌近60%，“大红袍”、陈年普洱等高端茶普遍遇冷。“茅台2012年上货价最高可到1800元，去年最低到了800元。”罗小刚说。

“只能暂时维持。”被问及今后的打算，罗小刚说，“先熬着，不行就撤。”

“过去这些东西都是高价卖给机构，老百姓一般消费不起，现在得琢磨怎么降价卖给普通消费者。”有高档食品经销商对记者说。

## 数量少利润低 倒卡“黄牛”下岗

相比于馈赠实物，互赠购物卡一直是官场屡禁难止的“潜规则”，一些体制内单位也将购物卡作为福利超额发放。不少人将卡变现获利，而倒卡“黄牛”们的“生财之道”，就是从这些人手里收卡后，再转卖给商场内的“黄牛”，倒一张卡的利润为10元到20元，以前一年能赚上七八万。现在“黄牛”则大倒苦水，“八项规定”让他们的生意至少缩水三分之一，感叹日子“不好过了”。

2013年12月底的一个下午，北京崇文门新世界商场前的广场上，倒卡“黄牛”们戴着帽子手套，缩起脖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们不时向路人低声问着“卖卡吗”，手中摇晃着由10余张购物卡粘在一起的“卡串儿”，但无人问津。

“卖卡吗？”记者刚一走近，一个女“黄牛”便问道，另外两个“黄牛”也凑了过来。女“黄牛”告诉记者，1000元的卡按九五折回收。当记者问及翠微百货1000元的卡时，她说：“翠微的卡以前能卖950元，现在最多700元。”

记者表示不解后，女“黄牛”悄悄地说：“翠微、百盛现在都是这个价，你没看电视吗？那儿的‘黄牛’被抓了好几个，现在都没人了。”

“这里倒是挺多的。”记者顺着话说道。女“黄牛”和同伴马上摇头：“这叫多？以前最多时有五六十人，现在也就十来个了。”

据记者了解，从2013年开始，很多“黄牛”只能赚取蝇头小利，难遇大宗交易。有“黄牛”直言，交易额减少最多的就是国企和事业单位。以往培养的固定“大客户”，不再打电话要他们上门收购，而是抱怨“单位发的卡少了”，这让不少养尊处优的“黄牛”被迫改变收卡方式，不得不回到商场门前，冒着寒风“站街”收卡。

“往年到年底这里全是收卡的，现在少多了，而且看他们转悠很久都没生意，我们心里特开心。”在长安商场门口，有市民告诉记者，“希望‘八项规定’能一直坚持下去。”